

灿烂与迷茫

——海城纪事

冉淮舟 朱海燕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灿烂与迷茫

——海城纪事

冉淮舟 朱海燕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灿 烂 与 迷 茫

——海城纪事

冉淮舟 朱海燕

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武清永兴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1插图 232千字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

ISBN 7-201-00161-2/C·28

定 价：（精）5.90 元

目 次

一	啊，西柳·····	1
二	乡村闹市·····	10
三	刁岐山和他的女儿·····	28
四	布衣大户·····	40
五	一支卑贱者的队伍·····	65
六	腐朽与神奇·····	74
七	春天的风·····	92
八	土地·····	121
九	冷夏·····	160
十	暖冬·····	178
十一	异彩纷呈·····	190
十二	养貉人及养貉协会·····	202
十三	陈香兰一家人·····	211
十四	吴氏三兄弟·····	227
十五	唐王山今昔·····	238
十六	共和国的长工·····	246
十七	“少帅”们·····	253
十八	共产党人·····	265

十九 同泽生辉	285
后记	318

一 啊，西 柳

西柳属海城。海城在辽宁。过去，海城叫县，1985年以后改称为市。市也是县级市，人还是那些人，地还是那些地。那么，现在和过去比较，究竟有没有什么不同呢？有。甚至可以说，有很多不同的地方。

已经很难说清楚具体是哪一天了，有一个农民模样的人，干脆说他就是一个农民，在北京的一家银行里，提取了二十八万元存款。这个数字，对于过惯了穷苦生活的中国人来说，不能不感到大吃一惊，甚至不能不觉得大为疑惑。他怎么能有这么多存款，他一次取出这么多钱干什么？于是问题就都来了，猜这猜那。总之，这个人值得怀疑，非常值得怀疑。警惕性很高的银行工作人员，立刻报告了公安部门。公安人员认真负责，跟踪到了海城。原来，提款者是西柳人，因卖布衣发家致富，二十八万元纯属正义之财，个人所有。公安人员感叹地说：

“呵，你怎么有这么多钱？”

这位农民爽朗地笑了，说：

“咱可不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打个比方，就象北京秋后的香山，咱是漫山红遍一枫叶。你看看西柳，瞧瞧海城吧。说句笑话你也可能不信，海城的钱没了腰，不会捞是熊蛋包。哈哈！谢谢你从北京到海城一路保护，欢迎你到家去做客。”

公安人员听了，一时感到有些茫然。

这不足为怪。历史才刚刚闪开一道缝隙，长期的贫困使人们对富裕很容易产生一种困惑迷茫甚至畏惧的感觉。因此，在通向富裕彼岸的航程中，人们的观念确实需要来个雄鸡一唱。

这件轶事，一经传说就云山雾罩起来，象是侦探小说一样。其实在西柳，在海城，正当变革的大潮，汹涌呼啸，石破天惊，一大批默默无闻的小人物，以改革家、企业家和种种大户的身份应运而生，谁没有一个或几个奇异的传闻！在这里，无论是光辉灿烂的晴空，还是晨起黄昏的片刻迷茫，都能引起人们的深长思辨——人生的昨天和今天，命运竟是这样截然不同。

《海城市志》财贸编记载：

1949年，年末工薪储蓄存款18户，金额为东北币1,837万元；

1958年，全县开展群众性集资，共集资310万元；

1978年，全县储蓄总额达2,415万元，全县每人平均储蓄25.24元，其中城镇人均均为61.54元，农村人均储蓄为19.04元。

1984年末，全县城乡储蓄总额为16,532万元，比1978年增加了5.8倍。

据海城市政府对外接待办公室负责人说，要了解“二十八万”的来龙去脉，必须找知根知底的人。西柳镇负责政工的党委副书记陈佐民，做过中学的团委书记，当过镇上的宣传委员，在西柳镇，也算得上一名理论家了，凡来西柳参观的领导、记者、教授、学者，一般总是由他出面接待。谈到“二十八万”，他既没有肯定，也没有否定。他说，西柳布衣大户到

底有多少钱，他这个当书记的也并不完全清楚。1986年，有一家把钱塞在坛坛罐罐里（老百姓习惯这样放钱，就爱这样藏藏掖掖的），结果罐子丢了一个。报案吧，说丢了二万九千元。后来破案了，案犯逮捕了。还有一家丢了一万八千元，说家里还剩四万多。关于这一家，人们平常还都认为不趁什么，没有多少钱。这个案后来也破了。具体说到“二十八万”，陈佐民认为可能有，也可能没有。他听说后古村有两兄弟到广州去买布料，携带三十万元现款，装了满满一纸箱。在北京站转车时，民警要检查。兄弟俩提出要求，检查可以，要到没人的地方，检查过后，铁路部门要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。结果检查了，列车工作人员保护两兄弟安全抵达广州。陈佐民不无感慨地说：

“西柳的富户有富户的想法。他们仅仅是怕露富吗？不！他们怕的是露富的后果。新闻单位若是宣传了他们，他们担心明天或后天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横祸临头。”

富裕也有后患。在建设文明的同时，还有不文明甚至罪恶的尘埃，杂陈出现。

小码头村李惠文，他在协助妻子佟恩芝经营布衣的实践中，已经积累起丰富的经验。关于“二十八万”的传闻，他认为不合逻辑，至于为什么不合逻辑，他没有加以破译。但他的谈话，却更进一步肯定了陈佐民的说法。他说西柳人外出购买布料，开始是把钱揣在衣袋里，后来买卖越做越大，布料购买一次比一次多，就改用皮夹装钱，一个个钱夹系在腰带上，就象系着一圈子弹袋。后来这办法也不行了，就改用纸箱子装钱。显然，这样做是不符合财务规定的。但他们就是不通过银行汇

款，因为让银行汇款，既费事又费时。他们计算过，通过银行汇款的工夫，几乎把一趟买卖给耽误了，也就是说到手的钱又撒手丢掉了。船小掉头快，手头带着现金活泛，一手交钱，一手提货，自己方便，对方喜欢。他们的经商手段，早已走出了国营企业转了几十年也没有转出去的轨迹圆圈。

“实话相告，”李惠文不无自豪地说，“西柳这样的布衣市场，只能是个体经营的天地，国营怕是干不了的。个体赚得勇敢，赔得大胆。今天五元一件的服装，明天很可能跌到两块，式样不断翻新，也就不断淘汰，如同大浪淘沙。只有个体经营才能驾驭市场时涨时落的风浪。”

后古村杨兆贤，一个布衣大户，他是第一个揭竿举起义旗，率领一支经营布衣的队伍，勇敢地走向大集的人。在西柳人的心目中，杨兆贤就是当今的陈胜、吴广。

“呵，二十八万的事吗，听说过。”他说话带有一股豪爽气，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“公安局追查过。带自己的钱不犯法呀！北京是大城市，二十八万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。”

西柳镇工商管理所指导员赵福山，是个朴实、热诚的人，他熟悉西柳市场，熟悉这里每一个经商的人。关于“二十八万”，他说：

“别人不信，我信。那是东柳村的一个布衣大户。他搞得早，没想到发家致富了。他是带着历史的余悸跃身改革洪流的，他怕共产党的政策改变，才把钱存到了北京的银行里。当他在洪流中推波助澜的同时，改革的波澜也在洗涤着他的心灵，他终于告别了自己的历史，无所顾及地投入到个体经济发

展的广阔天地里。我敢说，如果我们目前仍然走在‘左’的杂草丛生的路上，这些铁事传闻，就根本不可能产生。”

中共海城市委顾问鲍辉说：

“关于二十八万嘛，传闻不足为凭。但是银行工作人员却告诉过我这样一个信息，从北京的某家银行里，给西柳某个人汇来了五万元利息，这可能是几个人联合存款所得，也可能就是个人单独存款所获。利息五万，多大的数字。银行的同志遵守规则，没有告诉我户主姓名，还向我这个市委顾问保密呢！”

他笑了。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笑。1948年，他这个为解放军放手摇电唱机去向群众做宣传工作，从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放牛娃，在家乡的土地上已经奋斗四十年了。他的目标是什么？不就是要让乡亲们富裕起来吗！他接着说，有一个农民，看到邓小平接见美国电视新闻记者华莱士的消息，邓小平说：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。这个农民说：邓主任还不了解我们富裕的程度呢！

“你看看，一个普通的农民竟然和中国改革大潮的伟大导航者论争起来了。”鲍辉说到这里，禁不住爽朗地笑了起来，“当然，这里有一个百万富翁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含义的问题。小平同志所说百万富翁恐怕不是指那些仅有百万元财产的人。”

关于海城，鲍辉讲述了这样一组数字：

社会总产值：

1980年，73,581万元；

1983年，114,851万元；

1986年，292,225万元。

国民收入：

1980年，35,221万元；

1983年，59,469万元；

1986年，122,678万元。

工农业总产值：

1980年，54,988万元；

1983年，85,314万元；

1986年，204,886万元。

人均收入：

1980年，254元；

1983年，464元；

1986年，872元。

看了这一组数字，也就无须印证关于“二十八万”的传闻了。一位从外地来海城参观的人，在留言簿上写道：“海城1975年遭到惨重的地震袭击，1985年又遇上特大洪水灾害，可是到了海城，只闻灾情，不见灾容，乡镇企业依然迈大步，总收入居辽宁之首，东北之冠。神哉，神哉！”

近六十年前，西柳有位青年，随着“九一八”裂心碎胆的枪声，踏上了坎坷的抗日救亡之路。

这个青年的名字叫赵力耕。十五年后，在中美合作所与张露萍、冯传庆等烈士一起遇难。七烈士中，海城就有两位，除了西柳镇的赵力耕，还有感王镇的杨光。

由于特殊的使命，他们所做的工作鲜为人知。当他们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成立的时候，他们却仍然躺在息烽荒野丛生的土

堆里，戴着军统电台特务的帽子，在黄泉之下也不得安息。埋没他们的土丘逐渐没入荒草，将要和他们的英烈事迹一起泯灭人间，还要被人唾骂，永世遗恨。

1983年7月5日，叶剑英家里的电话响了起来，一位当年在中共南方局工作的同志，向叶剑英报告了一段极待开封的历史。1939年，由中共南方局决定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的张露萍、冯传庆、赵力耕等七名人员，经四川省委复查，将由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。

五天后，这位同志又来到叶剑英家中，向叶剑英详细地汇报了在中美合作所殉难的七名烈士的生平。叶剑英听后，激动地说：“记得，记得，带头人张露萍，外号叫‘干一场’。”

7月23日，四川省烈士复查小组的两位工作人员专程赶到北京。叶剑英深情地回忆证实：“四十年代初，我们有两名同志打入戴笠那里，后来暴露了。一天，一个叫冯传庆的同志找到周公馆，我们决定送他去延安。当时，我送他一件皮大衣，并且把他送到了江边。但他来的时候，已被特务盯上了，后来被戴笠的人捕去了。”

叶剑英的证词，无疑拂去了积累在张露萍等七烈士身上的历史尘垢，洗掉了泼在他们身上的污泥浊水，还他们真正共产党人的本来面目。

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那天，赵力耕告别家乡，辗转于长沙、上海等地。1938年考入武汉军统十二期电训班，毕业后被调到军统重庆电讯总台任报务员。因不满军统特务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，主动与共产党组织联系，经中共中央南方局审查批准，于1939年10月入党。在张露萍所在地下支部的领导

下，他通过各种渠道，把军统电讯台的人员、密码、波长、呼号、通讯分布等绝密情报，转给中共中央南方局。他与军统上层人物周旋，斗智斗勇，险象环生，历尽艰辛，入死出生。不幸与张露萍、冯传庆等被捕入狱。戴笠下令将他们判处死刑，缓期执行，转移到贵州息烽监禁。在狱中，他们遭到非人的折磨与摧残。赵力耕致残瘫痪，却还鼓励难友：“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坚持抗战胜利，我们今天坐牢，或许明天就会被敌人杀害，但是我们也决不后悔，因为我们所走的路是对的！”

1945年8月，抗战胜利的时刻，一道密令下达到息烽监狱，赵力耕和张露萍、冯传庆等七名同志，在离息烽三公里处的快活林被敌人杀害了。

1983年，张露萍等七烈士，经中共四川省委平反昭雪后，他们传奇式的斗争事迹便在全国传开。但是在赵力耕的故乡，反应并不强烈。难道因为，西柳人只是注目正在腾飞的现实，而忽视了并非久远的历史吗？

赵力耕烈士的弟弟名叫赵立纪，一位年满六十的退休中学教员。他说，他家是个书香门弟，他兄弟四人，父亲给他们取名时以“经纶纲纪”顺序排下来，大哥赵立经，海城人把“耕”念作“经”，赵力耕和赵立经念起来声音一样。大哥“九一八”走后，开始还有信来，以后就断了。几十年来，他们到处打听哥哥的消息，心想活应有信，死该见骨。这样盼到1983年，报纸上报道了张露萍七烈士的事迹，他们急忙给贵州省政协副主席韩子栋——小说《红岩》中的华子良去了一信。韩子栋热情回信，说有赵力耕这个人，确系海城人士。后来四川省

委有关部门也有信责成海城落实解决。三年了，哥哥的事迹登报了，市志也写上了哥哥的名字，可是哥哥的“户口”还没有落实到西柳，尤其是还没有落实到他们家里。

“现在办事太难了。”赵立纪最后哀叹了一句。

他是一个老实人。儿子赵正途开个旅店，取名“正途旅店”，守株待兔，一天也能接待一些客商。用赵立纪的话说，学不会赚大钱，只好靠挣两个死钱过日子。

这里是烈士的故乡。

这里有全国最大的布衣市场。

灿烂，迷茫。

这就是西柳。

二 乡村闹市

原先，西柳并没有市场，是一个冷冷清清的地方，一点儿也不热闹。镇政府所在地西柳村，全称应该叫西柳公屯，据说是因为村东有座柳公墓而得名，只是弄不清楚，这柳公和书法家柳公权有没有关系。如果再不把烈士赵力耕落实到西柳来，那么西柳的历史就显得既简单而又枯燥了。

过去，这里三万六千三百多人基本务农，自己种什么就吃什么，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，街上连卖瓜果蔬菜的也很少。但他们也有过因为衣食匮乏而遑遑不可终日的教训。他们终于懂得了商品经济的必要和重要，而商品经济又是离不开市场的。

1979年，东柳村有个叫丁岐山的农民，由于生活所迫，想到加工裤子销售，挣点钱维持生活。在他的带动下，这一行业迅速兴起。但直到1982年春节前，这里也还没有市场，销售的场所是无形的，飘忽流动的。公路边上，大柳树下，房山头旁，把一块塑料铺开，把裤子包一解，这就叫售货的摊床，上有天下有地，这就叫市场。北风冷嗖嗖一吹，卖货的人身上直发冷，心里也颤抖。因为天地虽然广阔，但卖裤子的地盘却在不断紧缩，以致连公路旁边也不让呆了，怕妨碍交通，实际上是怕传出去影响不好，有伤风化。还好，西柳有个夏天鸭子凫水，农民沤粪的水坑，三九天结起一层厚厚的冰，买卖裤子

的人们被撵到冰上来了。就是这样，人心也不安宁，买卖也做不稳当。

有一天，五、六十个民兵，忽然封锁了要道路口，包围了冰坑，撵得鸡飞狗跳。有个卖裤子的姑娘一看势头不妙，骑上自行车就逃跑。于是后面就追来了一辆吉普车。两个轱辘的自行车到底跑不过四个轮子的汽车，姑娘被追上了，她的裤子包被检查了个底朝天。李惠文回忆说，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时抓卖衣服的，就如同抓猪逮羊一样。

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西柳布衣市场一直处于一种“扫荡”和“跑反”的紧张状态。

海城执政的共产党人，担心西柳市场会改变海城的社会主义方向，于是派出人马进行调查。各级领导的看法虽然不尽一致，但认为西柳加工裤子会影响“以粮为纲”，妨碍农业生产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。因为摆弄这种玩艺，有的生产队延误了送粪，也有生产队长不忠于职守，被裤子生意所引诱，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；还有中小学教师也卷入裤子市场，讲课无精打采脑袋撞黑板；等等。调查人员在所起草的报告中，有句既形象生动又精辟的话，概括了西柳市场所带来的令人忧虑的后果，叫做“破裤子缠腿”——西柳的腿本来顺顺当当地走着务农的路，现在让大包小裹的裤子给缠住了。

这还了得？

问题严重！

其实，有这种认识并不奇怪。人们已经习惯走自然经济的轨道，对于商品经济的活跃难免忧心忡忡，甚至一惊一炸。但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日益深入人心，谁也不好明令取缔西柳市场。

那，怎么办？

有了，补税罚款。这不失为限制西柳市场的一个好办法。于是县工商税务部门的人员会同西柳公社（当时还未叫镇）的干部，组成工作组，分片包干，采取以往常用的突击战术，连夜挨家逐户地补税罚款。有的大队（当时还不叫村）一下子就从群众手中拿走三万多元。

补税罚款后，税务部门又突击刻出二十多个木头戳子，明令百姓：以后谁做出裤子都要卡上戳，一条交五角钱，不然的话不许卖。为检查落实这一规定的效果，西柳公社又组织民兵包围冰上市场，查看谁的裤子没有卡上戳。

这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，想尽了方法，但是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。西柳街面上显然是肃静得多了，但商品交易却依然进行，市场由集中又变为分散，由街头再回到家里，由大规模转入游击方式，由公开转入暗中。来自吉林、黑龙江等地的批发客商，已经有了比较熟悉的门路，老地方相见，随便一个暗号，一个手势或一个眼神，便领到家里去了。

农民是最讲实际的，因为他们得到了商品经济的实惠，就是有再大的强制力量，也难以扼制住他们刚刚焕发出来的积极性。不用说有的全家都披挂上阵，投入裤子的加工经销，就是有的民办教师，也利用假期卖几趟裤子，收入会比全年的工资还高。再让他们去过手头没钱的穷日子，行吗？

就在扼制西柳市场的这一年，在海城的一份年终报告上，却把西柳从事服装加工和推销，创造产值四十万元，利润八万元，作为成绩都写进去了。

这又是一种迷茫现象。